

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 生态研究

AN ECOLOGICAL STUDY
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陆秀英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I046/39

2012

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 生态研究

AN ECOLOGICAL STUDY
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陆秀英 /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33772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生态研究/陆秀英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10-05721-5

I. ①当… II. ①陆…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 046②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4755 号

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生态研究

陆秀英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80 千 定价:22.00 元

ISBN 978-7-210-05721-5

赣版权登字—01—2012—53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0791-86898827 电话:0791-8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翻译文学研究概述	5
1.1 “翻译文学”概念	5
1.2 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7
1.3 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	14
第二章 翻译文学生态系统的建构	21
2.1 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21
2.2 翻译生态学和生态翻译学的本质	23
2.3 翻译文学系统的确立	25
2.4 翻译文学生态系统的架构与生态分析	29
2.5 翻译文学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31
2.6 翻译文学系统: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35
第三章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描写	37
3.1 中国翻译文学概述	38
3.2 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	46
3.3 从《世界文学》看中国当代翻译文学	55

第四章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生态环境	65
4.1 翻译文学生态系统与其生态环境	66
4.2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68
4.3 翻译文学系统的内外操控机制	79
4.4 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	89

第五章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构成	99
5.1 翻译文学系统中的各种主体	101
5.2 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特征	118
5.3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主体特征综述	153

第六章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间关系分析	157
6.1 主体的主体性与主体间关系	159
6.2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主体间关系	160
6.3 主体间关系对翻译文学系统的反拨作用	191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的翻译文学生态系统的建构	196
7.1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的生态学启示	196
7.2 可持续发展的翻译文学生态系统	205

第八章 结 论	215
----------------	------------

参考文献	224
-------------	------------

绪 论

翻译文学是以译作形式存在于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学类型。大部分读者平常阅读的所谓外国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严格意义上说就属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功能,它能带来新思想、新观念,对于目标语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亦是一股巨大的推力。正因为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国内一些文学研究者开始编写翻译文学史或在中国文学史中以专门章节描述翻译文学断代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表明翻译文学对于现代汉语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有过积极推动作用。本书作者在此无意也无力编写当代翻译文学断代史,而是从翻译学相关视角考察当代翻译文学在中国当代语境里的译本选择,翻译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如何发生,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到译文接受和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翻译文学都受到一系列社会因素和规范的影响,如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因素。翻译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依赖各种主体来完成,包括赞助主体、创作主体、翻译主体、接受主体和评论主体,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里互相作用、互相关联,形成主体间关系网络。本研究试图借鉴生

态学整体系统的研究范式,尝试描述翻译文学生态系统,不仅宏观上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与“转型期”(新时期)进行历史的、功能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从微观的层面探讨当代不同历史语境里翻译文学的主体间关系、主体活动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生态学原理出发反思如何围绕生态环境和主体间关系两方面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翻译文学生态系统。

首先,本研究将翻译文学整体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下的一个子文学生态系统,其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本土文学的发展情况、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诗学、审美需求等各种环境因子;而系统内部则是由创作者、赞助人、译者、接受者、评论者等几大主体构成。翻译文学与其外部环境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是一种互动关系,且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发生都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翻译文学,随着当代新文学的形成和成型,从文学系统中心向边缘进行运动,并且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高度选择性,是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操控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文学已占据文学系统中心,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化采取了强烈的排斥和批判态度。文学翻译已经完全服务于同期的政治使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层赞助人对诗学权力话语的操控达到了极端的状态。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文学异质形式难以融入本土文学中,翻译文学几乎没有空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心附近游离,整个主流意识形态给予了其他意识形态及“专业人士”更多的诗学话语权和自由性,宽松的文艺政策使得翻译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

同时本研究将运用史学描述和个案分析对“十七年”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转型期”(新时期)等三大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形态、主体间关系、主体活动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梳理。在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主体间关系也相应改变,翻译文学主体们在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策略运用、作品传播和接受评论等活动中所体现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性也各具特点,最终使得翻译文学整个系统的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也不尽相同。“十七年”时期的翻译文学作品以“服务政治”为主要选材标准,译介了大量的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东欧、亚非拉等社会主义盟友国家作品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古典主义作品和“进步”、“革命”作家作品。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地位比较突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作品主题、读者的接受、翻译作品的评论都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导向且要接受“赞助人”的监督和管理。翻译文学系统主体间关系中赞助人成为了中心:赞助人决定翻译作品的来源和翻译作品的主题;赞助人规定译者的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赞助人规定谁作为评论者,并规定读者的解读视角。“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翻译的政治功利性达到极端,翻译文学成为禁区,只有少量作品作为政治批判使用而“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诗学话语权的极致操控,外来过强的政治环境因素破坏了整个翻译文学系统的文学本体审美功能,所有的主体身份模糊。曾经作为低层赞助人的期刊编辑、编委、出版社等的话语权也被更高级别的赞助人剥夺和禁声,其他主体的主体性也越来越模糊:译者几乎没有了作为译者的身份;不同层次的赞助人身份也纷纷消失;读者与专业评论人士的独立话语难觅,评论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文学与文学转型形成了一些文化和文学空白,需要吸收新的异质元素来填补,翻译文学也开始逐渐减少向政治意识形态靠拢,选材不再只

从政治需要考虑,更多是出于文学的需求考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期”里,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释放诗学话语权,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更多是为了满足文化交流和审美的需要。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间关系则突出表现在译者和读者地位的改变上,他们开始从“透明”和“隐形”中走出来,其主体性得到更自由的发挥,译者的自身审美意识、译者的选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译者的翻译动机等得到更多关注。读者作为翻译文学接受的主体和译作价值也体现在他们对于作品的多元化的阐释和解读、对于文本意义“延异”的积极探寻。

最后,本研究由生态学原理出发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演替进行了反思,认为将来新的环境下翻译文学生态系统长远可持续发展在于保持较平衡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和谐共生的主体间关系。翻译文学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生态环境需容许翻译文学作品形式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尽量减少某些社会环境因素的过多干扰,完善和丰富翻译文学系统的各种功能;和谐共生的主体间关系意味着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主动适应性选择,主体之间交互式平等对话形成交互式主体间性,从而更好地体现主体的主体身份并行使其主体性。

总之,本研究尝试把中国当代翻译文学放在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进行整体的、综合的考察分析,总结一些相关的翻译文学研究,并对全球化、商业化等环境下文学翻译新主体身份与主体关系进行了伦理性反思。期待本书能对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系统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第一章 翻译文学研究概述

1.1 “翻译文学”概念

“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的提法较早出现于一些国别文学史的编目中,其条目之下往往列出一串某个时期被翻译成了本族语且较有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阿英的《翻译史话》(1938)等书中都设有“翻译文学”条目。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文学,视其为一种文学现象,专门研究译作作为文学作品在目标语环境中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如佐哈尔(Zohar)、图里(Toury)、勒菲弗尔(Lefevere)等都对目标语中译作的传播、接受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国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种综合性、断代性、专题性、某一国别或语种的翻译文学史陆续得到出版,而真正对“翻译文学”进行定义、特征、性质、功能等详细阐述的是谢天振

的《译介学》(1999)和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2004b)。他们对“翻译文学”概念的解释主要如下:

“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应该完全混同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天振,1999:208-255)

“翻译文学”是从跨国界、跨文化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一种文学类型概念。它是一种文本形态,不同于“文学翻译”;中国的翻译文学不是“本土(中国)文学”,也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说它“特殊”,就是承认它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而不是我国作家的作品;说它“特殊”,就是承认翻译家的特殊劳动和贡献,承认译作在中国文学中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也就是承认了翻译文学的特性。(王向远,2004 b:1-7)

综合起来,“翻译文学”就是以译作的形式存在于目标语文化和文学中的文学(文本)类型。它不同于文学翻译,因为文学翻译是基于文学材料的一种翻译过程或行为。翻译文学的旅行轨迹是:某种异域文学经过目标语准入的层层关卡,通过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以译作的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进入到新的译语文化和文学里,并开始在目标语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本书所探讨的中国当代翻译文学主要指由中国当代译者所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一段时期内综合起来能够外显中国对外国文学接受的倾向和特征。

翻译文学在目标语语境的旅行过程中,对目的地的文化和文

学的现代性都起着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它能带来新思想、新观念、新的写作方法和异质文学形式,对于目的地文化和文学现代性是一股巨大的推力,这一点已经在中西方的历史长河中得到证明且也得到广泛认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即使维护和继承自己文学的民族特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自身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优秀的异质文学和文化元素进行借鉴和创新。

1.2 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无论是从国别文学发展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重要。单纯地讲,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得益于不同语言的译本才为更多的目标语读者所熟悉,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传播与接受,使更多的读者受益,由此文学作品的生命和价值也有了更多的延异。从更深层次上说,翻译文学的发展对目标语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中,翻译文学的发展对目标语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都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目标语文化的精神启蒙、新派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都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秦弓,2007:126)。

中国近代繁盛的翻译文学“介绍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及诗歌、戏剧,在开拓国人眼界,比照认识中国社会实际,促进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改变和影响中国文学传统模式使之逐步进入现代新阶段等诸方面,都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其意义不可低估”(徐志啸,2000:25)。近代以来,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寻找救

国良策,意识到“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则陈琳之檄,杜老之诗,读之有不病魔退舍,睡狮勃醒者乎!”^①这些有识之士通过翻译引进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试图唤醒国民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从而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翻译文学启蒙明智的社会功能凸显。同样,近代翻译文学表现在中外文学关系上的意义则更多表现为“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改变了文学语言;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施蛰存,1990:27)。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问世,西方社会的人伦风俗、婚恋观念、自由民主和独立意志等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纷纷呈现在了当时的中国读者面前,让他们了解西方现代文明并摆脱旧的文学观念的桎梏。现代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满足时代文化语境的社会和文学需求,即社会政治因素和文学性因素相融合,才达到繁盛,做到了经世开民,启发民智,同时又推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萌发。^②正如秦弓所总结的,“翻译文学成为人们想象和体验现代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近代翻译文学的出现造成本土文学观念的转化,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健全,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所缺乏的文体,使中国新文学摆脱旧文学的束缚,形成了既涵容现代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又包含现代文学规范之确立的崭新文学形态”(秦弓,2007:119-126)。

纵观西方的文学翻译史,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也非同寻常。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古罗马翻译了大量希腊古典作品,如《荷马史

① 梁启超:《〈十五小豪杰〉序》,转引自徐志啸,《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他们认为理想的翻译小说既要符合“启蒙的文学”的社会内涵,又要满足“文学的启蒙”的审美建构,即政治需求和文学追求相一致,而政治或社会需求又往往成为小说翻译的首要准则。

诗》和希腊戏剧作品等。这些从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语的翻译文学促进了古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乃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许多国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译出了《圣经》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作品,当时那些丰富的翻译文学作品对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翻译文学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功能。中国当代的翻译文学是何种形态、在当代社会语境里又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本研究试图对中国当代的翻译文学形态进行一番历史的、功能的描写和分析。这一点,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梳理和思考,如方长安(2003)的《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陈南先(2006)的《十七年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外国文学译介进行了归纳;秦为民(2007)的《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文学》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翻译文学进行过解读;谢天振(2009a)《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王友贵(2007)的《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则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的翻译文学情况。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整个中国当代翻译文学进行系统描述和细致分析的还比较少。

到目前为止国内翻译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模式:探讨翻译文学的地位、编写翻译文学史、结合翻译学等理论框架对翻译文学的发生以及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接受等进行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翻译文学研究多是属于前两种,即进行特定时期翻译文学的历史性、功能性、描写式的叙述,其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

(1921)、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独立的综合性、断代性、专题性、某一国别或语种的翻译文学史陆续得到出版,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玉刚等人撰写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孙致礼的《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1996)、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王向远的《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2003)、孟昭毅与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谢天振与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和《中国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等。这类翻译文学理论著作作用丰富翔实的史学资料记录了中国近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透过各种翻译文学史,我们可以感觉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逐渐在中国文学史中争取到了更多的承认和关注。

由于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本土文学的复杂渊源关系,王向远(2003:107-110)曾指出“翻译文学研究”既是“翻译研究”或称“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一种文学研究,是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翻译的理论、翻译文本、翻译家、翻译文学史等等所做的研究。高玉(2008)在《现代文学层面的翻译文学新研究》也谈到翻译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之为“翻译学”,是基于文化翻译学派各种相关理论框架下对翻译文学活动进行的研究;第二种为“接受学”,即在比较文化文学关系或译介学基础上进行的翻译文学作品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对翻译文学认识不断的深入,再加上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文化转向,翻译文学的研究逐渐在译介学和翻译文化学派视野中走向纵深。借助于翻译学、比较文学或接受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的研

究也日益向“文化”转向,开始从社会、政治、文化、文学、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翻译文学作品的选材、翻译、传播、接受和影响。

在西方,翻译文学研究一直与比较文学分不开,而比较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文化与翻译转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其专著《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曾说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993: 161)。尽管她于2006年修正了这种看法,但她仍认为“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①。谢天振认为,“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是将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2008 d:48),他所提出的译介学正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谢天振,1999:1)。在译介学的范式下,翻译文学作品被放到了更宏观的语境,研究者从历史、意识形态、赞助者、民族文学观等方面去考察分析译作的选择、传播、译介、影响以及翻译策略、翻译主体和翻译实践活动;从文化层面上探寻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翻译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与译作有关的问题。时至今日,国内翻译文学研究热点之一也仍是从中外文化、文学关系角度探讨翻译文学作品的选材、翻译、传播、接受、影响与社会、政治、文化、文学、意识形态等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如查明建(2004)、陈南先(2006)、秦弓(2007)、马士奎(2007)、高志强(2007)、胡翠娥

^① 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第9页。

(2007)、李琴(2008;2009)、谢天振(2009 a)、姜秋霞(2009)等一大批学者从特定时代语境入手,讨论不同时期翻译文学作品在动机、选材、翻译活动、传播、接受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及其与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文化或文学的互动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多元化翻译研究理论陆续进入中国,其中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影响广泛。以佐哈尔、图里、勒菲弗尔、巴斯奈特、赫曼斯(Hermans)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关注影响和制约翻译的各种政治、文学和文化规约等文本外因素。这种翻译研究范式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的潜层和背后,让人们看到了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翻译文化学派不立于微观的语言层面,而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跨文化转换,并开始了语言结构之外的性别、殖民主义、语境、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经济利益,历史和赞助者等社会因素的关注,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由原来只关注语言的一元性研究变成了关注语言结构之外诸因素的多元性研究。文化转向研究中的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文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甚至是一种市场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文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结果。由此,翻译文化学派框架下的翻译文学研究范式与译介学中的翻译文学研究高度契合:研究者把翻译文学作品被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探寻目标语环境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文化等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翻译作品的选材、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活动的实施、翻译作品的出版、阅读和评论等等。

翻译学文化研究范式除了关注翻译行为的外部环境外,也不断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以求对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等主体的地